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与非洲国家冲突

——以科特迪瓦为中心

刘伟才

内容提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跨界民族在非洲广泛存在。非洲国家独立后,跨界民族的存在推动了国际移民的发展,二者交织形成一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导致或者激化了相关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冲突。本文以科特迪瓦为中心对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及其与非洲国家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非常难以解决。

关键词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 非洲 国家冲突 科特迪瓦

由于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和殖民瓜分及统治,跨界民族在非洲广泛存在。跨界民族的存在给相关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一些地区甚至引发严重的冲突。同时,跨界民族作为一种跨国界的人员网络,跨界民族的存在对独立后非洲国家间的国际移民具有推动作用。而当规模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移民本身会带来一些问题,同时还会使由跨界民族引发的问题复杂化。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两者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从而使得由此引发的冲突难以解决。

西非是非洲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从地理上来说,西非由北往南大致可分成沙漠、萨赫勒地带(Sahel)、^①稀树草原地带和雨林地带,由西往东则可分成相对较闭塞落后的内地和相对较开放发达的沿海。自然条件的不同意味着经济发展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差异,西非不同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显著差异很早就促进了交换不同产品的贸易活动的兴盛,也导致了人口流动的频繁。在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影响下,为了寻求合适的土地和牧场,西非的居民也不得不做周期性流动。殖民统治建立后,由于殖民地工程建设、城市生活运转以及工厂和种植园等对劳动力的需求,西非地区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独立后,历史形成的人口流动模式继续发挥影响,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沿海国家和殖民时期法属西非的中心地之一,科特迪瓦(Cote d'Ivoire)^②是西非区域流动人口的主要接受国之一。本文将以科特迪瓦为中心对非洲的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其与相关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做初步的探讨。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莫西人迁徙与上沃尔特的变迁

作为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国家,历史上又曾经是法属西非的中心地,科特迪瓦长期以来吸引大量

^① 沙漠与草原地区的过渡地带。

^② 国内曾译作“象牙海岸”。

西非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入。在流入科特迪瓦的人群中,来自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①所在地区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科特迪瓦的外国侨民中,布基纳法索人有223万,占外国侨民总数的56%,占科特迪瓦总人口的比例也高达14.56%。^②

莫西人是布基纳法索的主要族群,其人口约占布基纳法索总人口的一半,此外在布基纳法索还有一些与莫西人有密切姻缘关系的族群。约12世纪时,莫西人从今加纳北部一带迁至今布基纳法索,征服了当地原来的居民,并建立了一些王国。但莫西人所占据的土地并不肥沃,因而生存条件并不好。为了应对困难,莫西人一方面加强管理,完善王国治理体制,提升凝聚力,这使莫西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顶住了外部王国和掠奴势力的侵袭,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中生存繁衍,人口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自然条件不佳和人口规模扩大也迫使莫西人不得不向外寻找出路,并逐渐形成了向外迁移的习惯。他们根据情况,或作数月的季节性迁移,或作数年的长期迁移,或永久性移居。一位法国学者说,“莫西人人丁兴旺,但因为农田产量不高,所以是很贫困的。莫西族的男子都喜欢到象牙海岸和加纳的种植园干活挣钱,在莫西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旱季期间总有四分之一的壮劳力外出谋生。……莫西人喜欢整年到外边挣钱。”^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用武力征服了莫西人的王国。起初,法国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军事区,由军官掌管行政,维持秩序。从1904年开始,这一地区在行政上被置于“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殖民地”管辖之下,该殖民地包括今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以及马里的大部分。1919年,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基础上建立了上沃尔特殖民地。法国在瓦加杜古派驻总督,受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大总督领导。按法国殖民地管理的规定,殖民地必须自己负担殖民地管理集团生活、工作所需的费用以及殖民地各种管理所需的费用,这对自然条件不佳、经济不发达的上沃尔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上沃尔特的民众也因此拮据困窘。这首先导致了公开的暴乱,但暴乱遭到严厉镇压;其次,大批人逃往英属黄金海岸(今加纳),这样既可逃避法国殖民当局剥削,又可在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比较好的黄金海岸打工寻找出路。当时,法国的大总督认为至少有十万莫西人因在棉花种植园劳动而最终定居黄金海岸。^④而另一方面,法属西非的各项工程建设也需要劳动力,科特迪瓦的白人殖民者的工厂、种植园和矿山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急迫。在这种情况下,对上沃尔特进行调整并将其稠密人口转化为殖民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便提上日程。

实际上,在还未占领莫西王国之前,法国人就认为可把这里当做法属西非的一个理想的劳动力储备地,数量众多、组织性强的莫西人可为法属西非的城市、工厂、种植园以及各种工程服务。1891年就有人指出,莫西地方人口稠密,而各种条件又并不适宜这么多人口居住,因此莫西人劳动力是一项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资本。^⑤1927年,法属西非的大总督明确指出:“沃尔特的劳动力对塞内加尔、苏丹^⑥以及科特迪瓦的各种企业而言不可或缺。我不同意上沃尔特不应成为其他殖民地的劳动力储备地的观点。这里有超过300万的居民,相当于整个法属西非总人口的1/4,因此将这些人口号召起来为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⑦虽然法国殖民当局和科特迪瓦的

① 1984年前称上沃尔特(Upper Volta)。

② 张林初等编著《列国志·科特迪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25页。

③ (法)皮埃尔·古鲁著,蔡宗夏、刘伉译《非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4页。

④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ó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⑤ 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 “Labour Reservoirs and Population: French Colonial Strategies in Koudougou, Upper Volta, 1914 to 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3, no. 2, 1982, pp. 205-206.

⑥ 指法属苏丹,约相当于今马里。

⑦ 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 “Labour Reservoirs and Population: French Colonial Strategies in Koudougou, Upper Volta, 1914 to 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3, no. 2, 1982, p. 206.

殖民业主早就在利用上沃尔特的劳动力,但并不充分。除了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流往黄金海岸外,作为一个有一套独立行政系统的殖民地,上沃尔特向科特迪瓦供给劳动力的渠道也并不畅通,一些上沃尔特的殖民官员会对科特迪瓦在上沃尔特征发劳动力设置障碍,以从中获利。^①

管理成本和劳动力利用上的不便使法国殖民当局开始考虑对上沃尔特殖民地进行调整。与此同时,科特迪瓦的殖民业主们也开展工作,积极推动对上沃尔特采取措施。1932年,法国殖民部颁布法令,取消上沃尔特殖民地,将15万平方公里土地、约240万人口划给科特迪瓦,6万平方公里土地、约80万人口划给苏丹,8万平方公里土地、约30万人划给尼日尔。“肢解”上沃尔特的计划遭到莫西人传统酋长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法国和科特迪瓦的企业能从上沃尔特获得劳动力而不付任何代价。^②由于莫西人传统势力不断斗争,1938年,法国将划入科特迪瓦的部分组建为上科特迪瓦,并派驻一名高级行政官员驻瓦加杜古,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946年,来自法国和法属黑非洲的800多名代表在巴马科集会,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非洲民主联盟,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当选为主席,而科特迪瓦则似乎卷入了一些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法国一些人士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缓冲科特迪瓦影响的实体。1947年9月,上沃尔特殖民地恢复。

在并入科特迪瓦的这段时期,每年由官方登记前往科特迪瓦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的莫西人约5万,而其他自行前往从事各种工作的莫西人则难以统计。为了获得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好感、争取重建上沃尔特,上沃尔特的传统酋长们还主动加强劳动力供给。在一封1941年致科特迪瓦总督的信中,莫西人的大酋长表示,“去科特迪瓦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将继续保证向政府各企业和开发殖民地的各企业提供必需的劳动力,凡力所能及,我们在所不惜。我们将利用这一方法争取在这方面更好地为法国的伟大事业、同样也是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工作”。^③而在另一封致法属西非大总督的信中,莫西人的大酋长则表示会努力把习惯于到黄金海岸去找工作的莫西人引向科特迪瓦。^④大部分莫西人定期往返于在科特迪瓦的工作地和原上沃尔特的家乡,但每年约有数千人留下,定居在科特迪瓦。^⑤再加上1932年前和1947年后的人口流动,在科特迪瓦居留和定居的上沃尔特人的数量无疑相当可观。

20世纪50年代,科特迪瓦进入“可可繁荣期”(cocoa boom)。可可种植的扩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当大,以至于产生竞争。为了获得劳动力,一些种植园主甚至通过授予土地或允许使用种植园土地的方式从外界吸引劳动力。这造成了一批在科特迪瓦拥有土地利益的外来人员。而且,一些外来人员通过在科特迪瓦打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而是经营自己的产业。这引起一些科特迪瓦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莫西人从贫瘠的上沃尔特来,不好好给他们打工,却抢他们的土地和饭碗。^⑥但是,由于对外来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科特迪瓦并未出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排斥外来人口的浪潮。

二、科特迪瓦经济形势的演变与国际移民问题的凸显

作为法属西非的经济大国,科特迪瓦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当经济形势较好时,对劳

^① Raymond R. Gervais and Issiaka Mandé, “From Crisis to National Identity: Migration in Mutation, Burkina Faso, 1930 – 196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3, no. 1, 2000, p. 62.

^{②③④}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ó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第81、174、175页。

^⑤ Elliott P. Skinner, “Labour Mig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o – Cultural Change in Mossi Societ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30, no. 4, 1960.

^⑥ Dwayne Woods, “The Tragedy of the Cocoa Pod: Rent – Seeking, Land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vory Coast”,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4, 2003.

动力的需求会比较大,当本国的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科特迪瓦可以并且愿意接受相对较多的外来人员进入。但是,当经济形势不佳,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甚至降低时,过多的外来人员进入就会对科特迪瓦本国人就业构成冲击,甚至原本就已经居留在科特迪瓦或已经取得科特迪瓦国籍的外来人员也会面临被排挤出去的威胁。一些利益集团或政治家会拿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做文章,用以争取支持者和打击异己。实际上,给对手贴上“外国人”标签已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党派竞争的一种手段,由于殖民瓜分和统治的原因,很多人都可以追溯出一些“外国”的关系。^①

在科特迪瓦,一旦出现“排外”,首当其冲的便是布基纳法索人以及与布基纳法索有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的人。

由于长期、大量侨居在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人非常重视团结互助,常常集群聚居,并建立自己的传统生活秩序。“这种紧密的结合同时有一种工会的性质,是对付企业主和雇主联合会的代表。它保证同族人的起码生计,也保证他们在国外、在往往是不合群的世界里能够立足于社会和习俗之中。”^②为了扩大自己的群体,已在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会努力为想来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和初到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提供指导和帮助。实际上,这种特点在莫西王国和上沃尔特时代就已形成。为了规范两国间的人员流动,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多次签订相关双边协议,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跨界流动的人员不愿接受规范,并总是有办法利用已成熟的人员关系网络逃避官方的控制,而布基纳法索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贯彻协议。

博瓦尼统治时期,科特迪瓦的族群冲突并不严重,排外现象也比较少。博瓦尼倡导“和解、仁爱、宽容、忍让”,一直坚持以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国内外争端,被国际社会称作“和平领袖”,受到广泛尊敬。在国内族群关系问题上,博瓦尼一直小心平衡各族群利益。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侨民,博瓦尼都力求一视同仁。在博瓦尼统治的前大半段时期(1960—1980年),科特迪瓦的经济形势也比较好,可可、咖啡的生产得到重视并发展,吸引了大量投资,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旺盛,外来人员的进入实际上是得到鼓励的。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科特迪瓦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民间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但博瓦尼领导下的政府仍保持平和态度。

博瓦尼统治的整个时期,包括布基纳法索人在内的外国侨民拥有与科特迪瓦国籍人差不多的权利,他们可以投票,可以购买土地,也可以获得政府职位。当然,布基纳法索人的大量存在并不断在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两国之间流动终究会引起一部分科特迪瓦人的不满。一些科特迪瓦的下层公务员喜欢刁难和勒索布基纳法索人,尤其是边境和移民部门工作人员。^③“本国人”和“外国佬”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存在的。

博瓦尼于1993年逝世,当时科特迪瓦的经济形势正日益恶化,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的不足促使各族群展开争夺,各种矛盾的积累使得族群和谐难以维系,“本国人”对“外国佬”尤其是布基纳法索人的敌视日益加剧。^④在这种形势下,以国民会议议长亨利·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为首的以科特迪瓦“本国人”利益为诉求的力量和以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为首的代表“外国佬”的力量成为科特迪瓦最高权力的主要角逐者,而后的国籍问题成为争端的焦点。

^① Beth Elise, “Citizens and Foreigner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8, no. 1, 2005.

^② (德)威廉·菲舍尔著、《上沃尔特》翻译小组译《上沃尔特》,第176页。

^③ Timothy Mark Mechlinski, “Burkinabè Experiences of Migration to and from Côte d'Ivoire”,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Annual Conference* 26–28, November, 2004.

^④ Cyril K. Daddieh, “Elections and Ethnic Violence in Côte d'Ivoire: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uccession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rican Issues*, vol. 29, no. 1/2, 2001.

瓦塔拉 1942 年出生于科特迪瓦,但据称其父母中有一方来自上沃尔特。瓦塔拉是一名经济学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任职,并曾担任科特迪瓦总理,是科特迪瓦开国总统博瓦尼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助手,在博瓦尼统治末期及博瓦尼逝世后的一段时期还曾代行总统职权,在科特迪瓦政坛有重要的影响力。

为了打击瓦塔拉及其支持者,贝迪埃拿起了“排外”这一武器。贝迪埃首先提出了所谓的“科特迪瓦化”政策,将大量居住在北方的拥有科特迪瓦国籍但与外国有密切联系的人以及外来移民视为非科特迪瓦人,限制他们的权利。紧接着,贝迪埃又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规,要求总统候选人和立法委员候选人的父母必须都是科特迪瓦人,这就直接剥夺了瓦塔拉的竞选资格。对于瓦塔拉在科特迪瓦经济事务方面的作用和客观贡献以及博瓦尼对瓦塔拉的重视,对手在无法否认的情况下声称,博瓦尼只看重瓦塔拉在经济事务上的才能,也只希望他在经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贝迪埃还变本加厉,对政府各级管理人员中有外国尤其是布基纳法索背景的人进行清洗,在北方实施恐吓,并将在科特迪瓦西南方工作生活的布基纳法索人强行逐出。^①

1999 年 12 月底,前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Robert Guéi)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贝迪埃政府。2000 年的选举竞争主要在盖伊和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之间展开,瓦塔拉仍然被以国籍问题为由排除在外。虽然瓦塔拉为此准备了相关文件,证明自己的父母是科特迪瓦籍,他自己也在科特迪瓦出生。但他的对手直指文件为伪造,并向瓦塔拉发出逮捕令。2000 年,科特迪瓦通过新宪法,再次确认了参与总统竞选的人的父母必须都是科特迪瓦籍。

巴博当选总统后,也实行排外,继续打压瓦塔拉及其支持力量,并试图清洗军队中的反对者,结果招致了 2002 年的军事政变。巴博指责布基纳法索政府卷入了这场政变。此时,所谓的“科特迪瓦人”和“外国佬”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的关系也一度紧张。2006 年,逾 36 万莫西人或上沃尔特人后裔以及布基纳法索人被迫从科特迪瓦回到布基纳法索。^②但是,这些排外措施反倒激起了北方族群和布基纳法索侨民的反抗,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瓦塔拉周围。而布基纳法索政府出于维护本国公民利益等考虑,也与科特迪瓦政府展开了交涉和斗争。2007 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巴博宣布瓦塔拉可以参加 2010 年总统选举。

2010 年底,总统选举角逐在巴博和瓦塔拉之间展开。两轮投票后,选举委员会宣布瓦塔拉获得 54% 的选票,胜利当选总统。这一次,以巴博为代表的排外力量没有对瓦塔拉的国籍表示异议,但对瓦塔拉支持者的国籍及相应的选举权提出质疑。瓦塔拉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科特迪瓦北方,尤其是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地区。在这片地区,既有拥有科特迪瓦国籍、与布基纳法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莫西人和沃尔特族群,也有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大量侨民,成分确实很复杂。据此,宪法委员会判定 50 万张来自支持瓦塔拉的地方的选票无效。按此进行计算后,获胜者就由瓦塔拉变成巴博。

双方都坚持对自己有利的投票结果,巴博拒不让位,瓦塔拉则自行宣誓就任总统。虽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科特迪瓦原宗主国法国等国家承认并支持瓦塔拉,敦促巴博下台,但巴博坚称瓦塔拉在选举中有不正当行为,并指责某些外部势力乘机操纵干涉,危害科特迪瓦利益,试图调动科特迪瓦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由此造成的危机持续发酵,内战再次在科特迪瓦爆发。最终,在法国的主导和直接支持下,支持巴博的力量被击溃,巴博本人则于 2011 年 4 月被捕,瓦塔拉正式成为科特迪瓦总统。

^① Jeanne Maddox Toungara,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Côte d’Ivoi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3, 2001.

^② Brad Kress, “Burkina Faso: Testing the Tradition of Circular Migration”,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USFocus/display.cfm?ID=399>.

三、从科特迪瓦冲突看非洲的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

2010年底由选举引发并发酵的科特迪瓦冲突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最终获得了一个解决。但纵观博瓦尼逝世以来的历次冲突,其所包含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跨界民族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移民问题互相交织。所谓的“本国人和“外国佬”之间的斗争,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又常以社会问题的形式体现和爆发。科特迪瓦的冲突绝不仅仅是一个瓦塔拉或其支持者的国籍问题这么简单,其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在非洲广泛存在的复杂“病症”——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以历史上形成的跨界民族为基础,在相关非洲国家独立后又以国际移民流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前者为后者提供刺激和支持网络,后者进一步使前者扩大和固化,两相交织,形成一个复杂难解的综合体。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在非洲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寻求资源和经济机会的人口流动、殖民国家任意划分边界造成的同一族体在国别上被分割、宗主国为便于管理和牟利而做出的以某些地方为主、以某些地方为辅的行政安排以及“分而治之”的政策,促进了跨界民族这一在非洲非常普遍的问题的形成。随着相关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殖民时期边界在法律上被认可,跨界民族成为难以变更的客观存在。而对经殖民分割和统治并由此被定义的非州国家来说,跨界民族不仅仅是同一民族的简单被分割,而是使同一人群的不同部分受到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塑造,人为地制造了难以弥合的鸿沟,造成了后来的种种争端和冲突。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在现实中往往继续朝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的方向发展。跨界民族在形成后,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更不会自动消亡,而是持续发展演变,它随相应国家内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相应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一国经济或政治形势的恶化会引发以此前已形成的跨界民族为网络基础的表现,为国际移民的外流,而在另一国经济或政治形势的恶化所导致的则可能是对原本存在的跨界民族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移民的排斥。跨界民族—国际移民存在一旦引发问题或者受某些问题刺激出现不稳定,就往往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两国甚至多国乃至整个区域的问题,从而导致态势高度复杂。

科特迪瓦由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而引发并激化的冲突只是非洲很多类似冲突的一个缩影,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西非除科特迪瓦外,历史上同样担当过殖民中心地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加纳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与科特迪瓦类似的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的影响。

南部非洲也是一个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表现比较突出的国家。由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和罗得西亚^①的矿业和大农场的发展,大量黑人劳工从包括今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等国在内的广大地区涌入南非和罗得西亚,从而形成较西非更为复杂的跨界民族存在。相关国家独立或建立黑人多数统治^②后,南非、津巴布韦吸引其他国家劳工的这种区域经济结构仍没有改变,之前形成的劳工吸纳体系继续发挥作用,国际移民劳工流动继续存在。而且,南部非洲的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还牵扯到白人种族主义与黑人民族主义斗争的问题,这使得跨界民族—国际移民问题长期成为南非与其他黑人独立国家特别是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等国斗争的焦点。可以说,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的存在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区域性大事项。同时,它也是相关国家内部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南非长期存在南非籍黑人对外来劳工的排斥,并多次发生针对外来劳工的暴力排外运动;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如果出生在黑人矿工家庭,那么其父

① 即今津巴布韦,1980年前白人种族主义当政时期曾先后称南罗得西亚、罗得西亚。

② 南非和罗得西亚较早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但是由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两国分别于1994和1980年转为由黑人政权统治。

母很有可能有一方不是“本国人”或者其本身的出生地不在“本国”,从而引发政治争端,赞比亚前总统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就曾因出生地是南罗德西亚而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

大湖地区受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当前,该地区仍混乱不堪,相关国家的政府军、形形色色的叛军和难民武装团体搅在一起,既使相关国家头疼,也让国际社会束手。大湖地区的冲突之所以具有持续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患上”了严重的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大湖地区湖泊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农业条件也相对较好,早在殖民时代前就是族群流动的频繁之地,跨界民族产生的自然基础非常厚实。随着后来一些大的酋邦乃至王国的形成,少数较大族群的分布越加广泛。殖民时代来临后,这些地区先是被包括比利时、德国、英国在内的殖民国家分割,后来经过整合,逐渐形成相当于今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国家的独立实体,同时涉及今南苏丹、肯尼亚、乌干达的部分地区,造成跨界民族的大范围分布。相关国家纷纷独立后,有的国家——如卢旺达——意欲扩大领土,有的政治或军事实权人士——如刚果(金)前总统劳伦·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意欲获取政权,从而利用跨界民族做文章,并通过国际移民制造混乱和介入借口,乃至直接挑动跨界民族叛乱和利用国际移民展开军事进攻等,引发了卢旺达大屠杀、刚果(金)内战等一系列备受国际关注的大事件。

四、结 语

以往论者常常只谈非洲的跨界民族问题而不涉及国际移民问题,或者将国际移民问题归并于跨界民族问题范畴,或者单论国际移民问题而不顾跨界民族问题。而实际上,从非洲的历史和现实来看,首先,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是两个需要同等重视对待的问题,不能以“跨界民族”概“国际移民”;其次,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又不是各自分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当然也不能分开来看。

殖民时代前即已长期存在的人口流动、欧洲殖民国家的任意分割取予、殖民统治时期政治上的分而治之和经济变动带来的劳动力流转,这一切使得非洲的跨界民族问题异常复杂,也使得相关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国际移民问题异常复杂。两种复杂问题交织形成一张难以理清的大网。对于这张“大网”,既不能快刀斩乱,也难以一一化解,恐怕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付出沉重代价才能探索出解决之道。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causes, there are many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Africa. After independence,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has been remaining and pushing forwa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two issues are interacted and form a kind of syndrome, which results in or catalyzes some African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y to country and among the involved groups.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itial analysis on the syndrom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flicts and argues that some relating conflicts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syndrome.

(刘伟才,讲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罗 薇)